

西方抹黑攻擊無法撼動香港法治

林鳴謙

日前，歐洲議會通過一項所謂的議案，肆意攻擊抹黑香港法治，甚至威脅制裁法官。黎智英案判決之後，國際輿論場又見這樣的熟悉劇本：不看判詞、不理證據，只憑立場先行，伺機抹黑香港法治，直接衝擊香港法治核心。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在2026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的一番話，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論調的虛偽之處，也再次講出一個最基本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常識——法治社會看的從來不是誰的嗓門更大，而是程序是否穩健、理據是否切實、裁判是否以法律與證據為依歸。如他所言，「威脅恐嚇無異於貪腐賄賂，兩者實際上是一體兩面，都是破壞公義的手段，不容於文明法治社會。」

對香港司法的評判，理應有一套共同標準，看的是判詞、證據、法律原則以及上訴機制。你可以不同意某個裁決，但若要提出嚴厲批評或相反意見，前提是先把判詞讀通，把法庭論證理解

清楚，再指出究竟哪一段法律適用有誤、哪一項程序不合規、哪一組證據推論不成立。這種「言之有據」，不是對法官的禮貌，而是對公眾負責。因為對於法治的討論，一旦離開判詞，就只留下情緒；離開證據，就只留下立場；離開程序，就只留下聲量。張舉能不點名指出，「批評須建基於判詞與論證」，其實就是要求人們回到同一套可以檢驗的系統——這正是文明社會能夠處理分歧的關鍵所在。

無人能凌駕法律之上

尤其值得社會警惕的，是有人要求中止某個法律程序，乃至基於背景與職業而提早釋放某被告人。這類要求不僅是對既定法律程序的規避，更是直接衝擊法治核心。程序不是可有可無的繁文縟節，而是公義得以成立的護欄。如果因為「某人身份特殊」「某某政治敏感」「某方聲量很大」便要改變程序，香港今日的法治就會變成「看人下菜碟」；而一旦開了口子，明天任何人都可能成為被針

對或被豁免的對象。法治最重要的信念，就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因地位、職銜、人脈、財富、政治聯繫而有差別。真正支持法治的人，必然同時支持法庭按既定程序走完該走的路——哪怕結論未必合乎個人心意。

張舉能特別談到美西方針對香港法官的「制裁」威脅，直斥其本質是以有悖法治的方式干預司法獨立，指出威脅恐嚇與貪腐賄賂其實是一體兩面，都是破壞公義的手段。這個類比十分犀利，也提供了觀察外部干預司法的新視角。過去，人們容易把「干預司法」理解為下達行政指令、施壓裁決；但在當今地緣政治環境下，更常見的是「以後果逼你自我審查」——用「制裁」名義製造寒蟬效應，讓法官、檢控、辯方甚至整個制度承受額外風險，妄圖令司法工作偏離法律公平公正的初衷。這種做法是赤裸裸地把強權政治之手伸進法庭的一種手段。文明法治社會之所以不能容忍貪腐，是因為它用私利扭曲裁判；同樣地，文明法治社會也不能容忍恐嚇與制

裁威脅，因為它用霸權外力扭曲裁判。兩者的共同點，都是要把「法律與證據」這條主軸擠走，換成「你怕不怕、你聽不聽」的脅迫。

虛偽雙標讓世人恥笑

香港作為國際化、多元化的法治社會，同一事件難免會面對不同立場的評價。評價固然有其立場，批評卻不能沒有底線。當某些人把不合己意的判決說成「法治已死」，這種說法本身顯然經不起推戴。法治不可能一日生、一日死，亦不會因個別案件結果而忽然崩塌或復活。香港法治的堅韌，在於它有一套完整的制度鏈條：清晰的法例、公開的審訊、詳盡的判詞、可行的上訴、專業的裁判。

案件若仍在法律程序之中，任何被指稱的錯誤——無論程序或證據——都應在上訴機制內被依法檢視。這正是香港法治「自我修正」的能力，也是香港社會能夠持續贏得信任、保持繁榮發展的根本原因。

面對攻擊抹黑聲音，香港市民最應該做的，不是跟着口水漩渦打轉，而是更堅定地把法治原則理解到位：判案看法律與證據；程序要走完才叫公義；批評要有根有據才值得認真對待；任何以威脅、恐嚇、制裁去干預司法獨立的行徑，都與文明法治格格不入。我們把這些原則守穩，香港就能在地緣政治角力中保持定力，既不因外界壓力而走樣，也不因輿論噪音而失準。

美國肆意威脅入侵丹麥，歐洲議會不敢吭一聲，卻對香港指手畫腳，虛偽雙標，讓世人恥笑。他們越是如此越堅定香港人維護法治決心。

歸根到底，法治從來不是用來討好誰的，它是用來保護好人、懲治壞人的。真正的法治信心，不是相信「法庭一定判我想要的結果」，而是相信無論結果如何，法庭都會按法律與證據、沿既定程序作出裁斷。只要香港守住這條底線，外界再怎樣炒作，也只能在聲量上喧嘩聒噪，難以撼動這座城市的法治根基。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破浪前行：香港引領內企出海新角色(上)

梁文道 賈文薈 羅昊 智庫說

近年來，隨着國家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愈來愈多內地企業意識到，若固守本地市場，發展空間將日益受限，「不出海，就出局」已成為不少內企必須直面的現實。國家商務部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錄得年比增長8.4%，其中民營企業的投資額增速更達到24.6%，反映出內地企業主動布局海外、尋求新增長動力的迫切態勢。

這不僅是數量的增長，更是出海模式與內涵的深刻演進。作為本系列評論的上篇，本文將重點分析內地企業出海模式的演變、新興市場的機遇，以及簡述香港服務體系的當前建設與挑戰。

過去，內企出海主要依託勞動力與成本優勢，通過對外貿易將產品銷往全球。隨着內地生產成本上升與國際貿易環境變化，部分企業轉向產能出海，在海外設廠以貼近市場。然而，這兩種優勢模式高度依賴價格競爭，限制利潤增長空間，且易受關稅壁壘衝擊。在全球供應鏈重塑與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傳統出海模式面臨挑戰。

躍升為「生態主導者」

在此壓力下，企業出海模式正經歷由成本導向過渡至價值導向的深刻轉型，逐步邁向品牌出海與科技出海的高增值階段。一方面，科技出海推動企業輸出核心技術、專利與服務，謀求佔據產業鏈上游。

另一方面，品牌出海則幫助企業實現從代工跨越到自主發展，提升溢價能力與用戶忠誠度，從而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

伴隨這一轉型，企業在出海過程中衍生出更為多元、專業的服務需求，涵蓋海外市場調研、跨境融資、團隊組建、知識產權保護等，貫穿前期規劃到在地發展全流程。

然而，中美貿易摩擦持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均增加了企業在歐美傳統市場的營運風險。在此背景下，越來越多內地企業主動調整全球布局，將目光投向南興市場。數據顯示，2025年國家對「一帶一路」市場的進出口量已佔總額的半數以上。其中，對東盟、拉美的增長接近10%；對非洲的出口規模更相當於對美出口的一半以上。

這些新興市場不僅有助於企業分散貿易風險，其產業結構更與內地企業出海動能緊密契合：東盟、拉美、非洲等地在承接製造業轉移方面仍具比較優勢，同時也在數字經濟、綠色能源、基礎建設等領域產生新的需求增長點，為內地企業從產品輸出邁向科技輸出提供了重要舞台，推動企業出海格局走向更加均衡多元。

面對企業出海模式的升級與新興市場的拓展趨勢，國家不斷深化「走出去」戰略，逐步構建起支持企業出海的政策體系。自1979年首次提出「出國辦企業」至今，國家相繼推出稅收指引、合規指南、海外服務體系建設等政策，並在

「十四五」規劃、「十五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提出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體現國家對企業出海的長遠布局。

香港積極主動對接國家戰略，不斷完善相關政策部署：從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發展「總部經濟」，到2024年推動「構建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再到2025年宣布跨部門成立「出海專班」，啟動「香港專業服務出海平台」與「出海專業服務專家委員會」，體現政府致力於整合資源、優化流程，為企業提供全流程、一站式及高質量的出海服務。

出海模式轉向高增值

這些舉措已初見成效。數據顯示，2018年至2024年間，母公司在中國內地的駐港公司數量從1591間增長至2620間，增幅達64.7%，其中2024年增長尤為顯著，反映出香港作為內地企業出海首選平台的吸引力正持續提升。

儘管香港在專業服務等方面優勢突出，內企在利用香港出海平台的過程中仍面臨兩地服務協同性不足、融資渠道有限、落地資訊不透明等問題。這些問題若未獲改善，將影響香港出海服務的整體效能；同時決定了香港能否從「服務提供者」躍升為「生態主導者」。

我們將在下篇中，對這些挑戰的解決方案進行深入探討。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

梁帆

青年評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將於2月25日發表，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正就預算案進行公眾諮詢，他日前在網誌中表示，新預算案旨在「釋放經濟潛力、增強發展動能、普惠民生」。身處2026年，香港面對的內外形勢已截然不同：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調整，內部深層矛盾亟待疏解，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賦予新的戰略坐標。就此，筆者認為，若只是零散推政策，恐怕難以應世界之變答時代之問。預算案應實現從「短期紓困」向「結構性投資」的根本轉變，可圍繞三個方向精準發力，引領香港破局新生。

第一，以雷霆手腕破解住房「老大難」問題

這是民生福祉與社會穩定的基石，也是釋放內需的關鍵。隨着《簡樸房條例》即於3月1日正式生效，規管不合適居所雖有必要，但預算案的政策重心應更進一步，從「規管存量」轉向「加速替代」，啟動一場根治劏房問題的攻堅戰。這不僅需要設立專項「劏房居民過渡基金」，為受影響的家庭提供搬遷與租金支援，更需以創新手段提速供應，例如運用組裝合成技術，在市區地段加速增建過渡性房屋，並推出「公屋提前上樓」特別安排，讓長期輪候的劏房戶看到實質性希望。長遠而言，政府應通過優化重建補償機制，鼓勵老舊社區整合重建，從源頭上消除劣質住房的生存土壤，將「安居」從願景變為可實現的路徑。

第二，產業政策從「廣泛扶持」轉向「精準聚焦」

香港資源有限，必須集中火力。預算案應果斷引導資本與政策，投向具有本地科研優勢、又能與國家戰略急需緊密對接的領域，例如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微電子及綠色科技。具體而言，相關部門可考慮從未來基金中撥出專款，設立主題投資組合，以市場化方式重點扶持上述領域的本地研發與成

果轉化。同時，在北部都會區等新發展區域，為屬於「新型工業化」範疇的企業提供具吸引力的土地與租金優惠，並配套「產業鏈嵌入計劃」，鼓勵本地中小企業為其提供高附加值配套服務，從而形成有根植性的產業集群。產業政策的核心，在於將香港的高校實驗室、灣區內地城市工廠和國際市場高效地連接起來，將論文轉化為產品，將創意轉化為產值。

第三，以「摸得着、用得上」的方式對接國家規劃

主動對接「十五五」規劃，不能停留於口號。預算案應着力搭建實體化橋樑。例如，可啟動「香港國際資料託管服務中心」的可行性研究及前期建設，利用香港普通法制度和國際信任，服務於國家資料跨境安全流動的戰略需求，吸引研發與金融資料在港處理，創造高價值職位。

同時，針對「十五五」規劃重點發展的領域，如綠色金融、先進製造、數字經濟，設立專項的「大灣區職業資格認證與就業資助計劃」，全額資助青年考取相關內地執業資格，並提供入職激勵，系統性化解北上發展的專業壁壘。此外，在北部都會區的民生規劃中，可直接引入大灣區優質的醫療、安老服務機構，以政府購買服務方式運營，讓新市鎮從誕生之初就承載「灣區優質生活圈」的示範功能。

站在財政資源緊絀的現實面前，完成上述轉型更需決心與智慧。這要求要同步推動公共財政改革，通過數字政府建設整合服務、提升效率，並全面檢視各項經常性支出的成本效益，將節省的資源轉而投入上述關乎未來的關鍵領域。2026年的財政預算案應成為一份告別零散補貼、轉向結構性投資的宣言書。唯有以住房破局換取社會穩定，以產業聚焦重塑競爭優勢，以深度融合開拓廣闊腹地，香港方能真正釋放潛能，在國家的宏偉藍圖中寫下不可替代的篇章。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美國「唐羅主義」是中歐關係新契機

宋魯鄭

看大勢

2025年已經被美國修理得灰頭灰臉的歐洲，在新年來臨之際又遭美國重創：強行擄走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夫婦、一再威脅要吞併北約和歐盟成員國丹麥的領土格陵蘭島。從常理上講，俄羅斯和中國長期是委內瑞拉重要的夥伴國，首當其衝的應該是它們，但何以歐洲卻成為最大犧牲品。

首先，特朗普以實際行動坐實了他的新門羅主義——「唐羅主義」：回歸西半球，自掃門前雪。然而此時的歐洲正迫切需要美國的軍事存在和支持：一年多來俄羅斯在烏克蘭不斷加速挺進，歐洲面臨日益巨大的壓力。現在歐洲總算明白了過去一年特朗普何以如此親俄：與普京舉行高峰會，使俄羅斯擺脫西方孤立，還提出符合俄羅斯主張的28點和平方案。

其次，所有人都意識到美國吞併格陵蘭島不再是戲言，而是實實在在的威脅。再沒人懷疑特朗普的決心和效率。從軍事上講，歐洲無力保護丹麥，不僅距離遙遠，更重要的是美國在格陵蘭島有軍事基地，都不需要再派兵。諷

刺的是，從二戰到冷戰，美國一直是保護格陵蘭島的唯一力量。尤其黑色幽默的是，丹麥採購的是美國武器，但根據雙方法律，沒有美國的同意，丹麥無權使用。

哪怕歐洲想象徵性的自衛，依賴美國安全的中東歐和波羅的海國家也會堅決否決。與美國關係良好的意大利、匈牙利更不用說。

但如果歐洲僅口頭上譴責，以至於丹麥身為北約成員國，連自身領土都保不住，那麼對於加入北約和歐盟的國家來講還有什麼意義？這也是為什麼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聲稱「如果美國選擇對另一個北約成員國發動軍事攻擊，那麼一切都將終結，包括北約組織，以及自二戰結束以來建立的安全體系。」

這話非常正確，只是在美國看來這是甩掉了一個包袱，只有歐洲才是受害者。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烏克蘭戰線還能維持的住嗎？只怕是一昔崩盤。

第三，歐洲的道德困境。

一是從歐洲的角度，美國擄走馬杜羅夫婦，是對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的侵犯。但出於現實利益，歐盟既不能譴責也不能制裁。對於一向重視道義的歐洲

來講，它被逼到雙重標準的牆角，自我打臉。

二是歐洲正在與俄羅斯全面抗衡，但俄羅斯針對的是既非北約也非歐盟成員的烏克蘭。即俄羅斯沒有侵犯北約國家的主權，這和美國現在做法正相反。從安全利益上講，歐洲實是應該把美國當作頭號威脅，但現實卻無能為力。

最後，自特朗普重返白宮後，歐洲出於俄烏衝突的需要，不得不對美國實行綏靖政策，忍辱求全：接受不平等的關稅並承諾採購7500億美元的美國產品和進行高達6000億美元的投資、按美國要求將國防開支提升至GDP的5%、容忍美國的親俄政策和上不了談判桌的屈辱、容忍美國對歐洲極右政治勢力的支持、當美國制裁五名歐洲公民包括法國前部長布雷頓禁止他們入境時，歐洲僅僅是抗議而沒有報復。美國擄走馬杜羅歐洲也沒有譴責。甚至歐洲在和中國的對抗中比美國走的更遠。

然而，這一切並沒換來美國的尊重和回報，相反變本加厲。直到今天赤裸裸的要侵犯丹麥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觸及到了歐洲無法接受的底線。

不管美國未來是用武力還是強迫收

購的方式，在吞併格陵蘭島的那一刻，就把歐洲逼到退無可退的境地。也就是說再也無法維持大西洋關係了，北約也就真的要腦死亡。在這個時候，中歐關係也就迎來了變化的契機。

中歐之間雖然分歧很多，比如價值觀、經貿、台灣問題等，但從最重要的安全角度來看則有兩個因素：一是美國的對華立場。二是俄烏衝突。

自從美國對中國實行遏制政策以來，歐洲作為美國的盟友，也不得不跟隨。但是現在發生了兩個變化。一是中美已經休戰，而且新門羅主義表明亞洲的事務美國已無心捲入。二是從關稅到格陵蘭島，美國已經不再把歐洲當作盟友，特別是《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否定美歐價值觀同盟基礎、支持民族主義政黨、弱化歐洲團結，認為歐洲文明即將消亡。以至於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認為美國越過了紅線，德國總理默茨聲明部分內容不可接受。

一方面美國在行動上不再把歐洲當盟友——其行為危害度超過俄羅斯。另一方面中美也實現了休戰。因此，當下中歐關係的美國因素消失。至於俄烏衝突，由於美國立場的變化，歐洲第一次

意識到中國的和平方案和努力要遠比美國更合理、更公平、更可接受。

安全是任何一個國家和政治體最重要的戰略利益，以上兩個變化因素都事關歐洲的安全。因此，當下中歐關係發展的主要障礙得到化解。

當然客觀形勢的變化未必能夠迅速轉化為中歐關係的推進劑。一是任何政策都有慣性，歐洲要改變並不容易。像面對特朗普，歐洲就長期抱有幻想，直到一再撞上南牆。二是歐洲作為一架複雜、龐大而臃腫的政治機器，運作和調整相對於主權國家來講非常緩慢。

我們只能說有利於中歐關係發展的外部環境已經出現，能走到哪一步還要看雙方的共識。目前已經有的信號是下半年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愛爾蘭總理已經訪華，而且雙方談的重點之一就是中歐關係。隨後歐洲重要的國家英國首相、德國總理也即將來到中國。

總之對於面臨困境和危機的歐洲來講，機會已經來臨，就看是否能夠抓住這重要的歷史機遇，和中國攜手維護國際秩序，走向戰略自主。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